

责任编辑:杨光
电话:010-63070416
E-mail:yg3721@263.net

我国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现阶段我们可以在保持闲暇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调整闲暇时间的分布结构,以释放出闲暇对消费的结构拉动效应

调整闲暇时间分布拉动消费马车

魏翔 邓州

从传统的观念看,消费的多少由收入所决定,消费的增长来自于收入的增长。这种观点在工业化初期的社会非常实用,因为在工业化初期,消费的最大约束来自于有效收入的不足。此外,还有一点经常被人忽略,在工业化初期,人们的消费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人们的消费除了解决温饱问题之外,还要满足对消遣和发展的需要;其次,消费不再是在瞬时完成,例如娱乐、旅游等新兴的消费形式需要消耗一段相当长的连续非工作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消费不仅仅是花销人们的收入,同样也花销自己的闲暇时间。此时的消费增长不仅仅需要收入的进一步增多,也需要不断扩大的闲暇时间,特别是连续闲暇时间。但是,闲暇的增多势必减少工作时间,进一步减少工资收入,又反过来影响消费的增长。于是,闲暇时间对消费增长形成“促进”和“挤出”两种效应。增长闲暇时间一方面提供了消费增长所需要的时间条件,另一方面又“挤出”工作时间,减少劳动收入,阻碍消费的进一步增长。闲暇与消费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困惑着闲暇政策的制定者,也让普通劳动者在选择休假与加班之间感到两难。

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释可能牵涉到复杂的数学推断,但我们也可以从大多数人所熟知的社会现象对闲暇时间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基于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国情,通过经验数据,我们仍可以找出闲暇时间与消费增长在短期内存在的简单的促进或阻碍关系。

首先,假使人们的消费都在瞬时完成,消费不需要任何时间,闲暇时间的存在和增长也不见得就会因为缩短了工作时间,减少工资收入而影响到消费的增长。人们对闲暇的偏好由来已久,且这种偏好从未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上几次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都不是以大量牺牲劳动者为闲暇时间为条件的。其实,工业化实现的生产力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劳动者稳定的规律的闲暇时间的出现。闲暇时间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促进来自多个方面:

第一,闲暇时间是劳动力得到再生的时间。劳动者在一段劳动时间后需要必要的时间补充脑力和体力,具体表现为饮食、睡眠和必要的处理个人生理事务的时间。随着现代社会工作强度的增大(虽然劳动时间可能缩短),劳动者需要用以恢复劳动力的时间有扩大的趋势,如果这个时间不能得到满足,势必影响到工作时的状态,严重时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近期发生在西南某地的大学生因为三份兼职而累死,以及深圳某IT企业年轻白领操劳过度失去生命都是劳动力没能得到必要再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实例。

第二,闲暇时间是生产率提高的时间。生产力的发展来自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和劳动技能的进步,而后者的重要条件便是劳动者有足够多的时间进行再学习,再提高。这些都需要劳动者在工作之后,在必要的劳动力再生时间之外,还有充足的时间。

第三,闲暇时间是非工资性收入产生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劳动所得的工资之外,人们在合法的范围内,通过投资、储蓄、炒股、租赁、中介、咨询等多种方式获得额外的收入,甚至一些人的非工资收入已经远远地高于工资性收入。而获得这些收入都需要人们在工作之余有足够多的时间。同时,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提高又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所以闲暇时间在作为工作时间替代关系的同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通过闲暇时间,再生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效率,并且,通过居民在闲暇时间的有收入的活动,直接获得收入。因此,闲暇时间增加并不见得就是减少了收入,从而阻碍了消费的增长。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闲暇时间恰好是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增长。

闲暇时间的作用还远不止上面的叙述,我们一直忽略的那个重要条件——消费不是瞬时完成的——对于目前的我国经济来说非常重要。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来自于内需不足所造成的国内消费疲软,消费不足所带来的危害可以以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中获知——如果一个蜂巢只有生产蜂蜜的工蜂而没有消费蜂蜜的蜂王,将最终崩溃。经过反复调研所得的结果看,内需的不足

并不源于人民收入的不足,国家不断实行减息和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消费疲软的国民经济局面。通过延长和集中闲暇时间是政策制定者为促进我国消费增长的另一种尝试。从1995年开始五天工作制到1999年执行的黄金周制度,闲暇制度的创新在拉动内需上展现出一定效果。特别是黄金周制度,经过8年的发展,尽管中间还经历了非典的冲击,如今已是中国居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受到了社会各界最为广泛的关注。

1999年,黄金周制度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拉动国内需求所服务的,政策的制定者试图利用一个较长的连续闲暇时间来促使居民增加那些在较短时间不能满足或不能深入满足的需求。黄金周制度的实施确实刺激了潜在内需。以黄金周冲击最大的旅游业为例,自1999年第一个黄金周以来(发生非典的2003年除外),每年三个黄金周期间的旅游接待人数、收入均占到全年总量的20%以上,换句话说,中国旅游业在三个黄金周20余天的时间所创造的财富和价值占到一年的四分之一左右。黄金周在促进旅游,特别是国内旅游大爆发的同时,也对消费品的销售带来巨大冲击,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全国消费总额高达3000亿,占去年全年总量67177亿的近5%。

闲暇时间在作为工作时间替代关系的同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通过闲暇时间,再生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效率,并且,通过居民在闲暇时间的有收入的活动,直接获得收入。因此,闲暇时间增加并不见得就是减少了收入,从而阻碍了消费的增长。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闲暇时间恰好是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增长。

为了更好地发挥闲暇时间对促进消费的作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去做:

第一,鼓励与提倡终身学习的观念、加大继续教育力度。当闲暇时间里从事的活动促进行为人的产出率和工资率时,闲暇时间的增大能促进消费增长。接受继续教育、进行业余学习是闲暇时间的重要内容,通过该项内容的提高,因此,从提高生产效率和消费增长率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在全社会建立完善的“3L”(Life Long Learning)体系,即终身学习的体系,建立门类完善的职业学院、在职培训系统和夜校等,建立健全其认证系统、监督体制,同时也大力引导企事业单位接纳和认同该种学历的各类人员。

第二,继续引导人民消费多样化、丰富化的程度,鼓励多种消费方式。闲暇时间增进了我国的消费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居民对多样化消费的倾向在改革开放后逐年提高。因此,鼓励居民对多样化消费的欲望,鼓励居民多样化的消费方式,那么闲暇时间的增多,不仅能够提高行为人的效用和效率,还可以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

第三,促进人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增大服务业的比重。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非工资性收入对消费增长有积极作用。同时,在闲暇时间里,人们所消费的服务或产品大多是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如娱乐、旅游、教育、金融等服务或产品。通过提高行为人收入结构多元化的程度,同时加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能够在增大闲暇时间的同时保证消费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

“国六条”之后房地产政策何去何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尹中立

从2005年至2006年这一年多时间里,房地产政策层出不穷,从“国八条”到“国六条”等,让人目不暇接。毋庸置疑,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正确把握房地产政策的未来走向不仅对房地产投资者有战略意义,而且对从事证券投资乃至专业的商品期货市场市场投资者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国八条”为何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国八条”出台之后,上海等城市的房价得到了遏止,但北京、深圳等城市的房价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部门之间的博弈和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使房地产政策难以落到实处。2005年中央针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控或许是经济领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个部委之间的协调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应该看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是很困难的。本次调控虽然艰难地实现了协调作战,但最终仍无法摆脱行业利益的桎梏,如何协调管理,即便在调控过后,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多个主管部门需要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房地产调控中,税收政策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未来可能会出台的政策包括:不动产税、消费税,也有可能修改所得税法,对房地产的转让实行累进的税率。如果这些政策出台,都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明显影响

这场利益的博弈还包括地方政府,不少地方政府在执行房地产新政时阳奉阴违。例如,“国八条”中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调整住房结构,增加经济适用房的比例,但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下半年,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增长速度不是加快而是放慢了;按照规定,出让的土地必须在两年内开发,否则要收回,但该政策也无法得到落实。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官员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这是分析房地产政策效果的关键。

人民币升值预期使金融政策无法得到有效施展。在房地产调控中,金融手段包括利率、信贷、首付比三个方面,在资金过剩的背景下,这三个方面对调控的作用都十分有限。

第一,利率。从2004年10月至今,央行对利率进行了三次调整,总体上提高利率。但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利率上调的空间非常有限。2006年4月,央行提高贷款利率的同时保持存款利率的不变,说明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利率有很大的制约,道理十分简单,如果存款利率上升,就会有更多的国外热钱涌入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更大。因此,利率的操作空间是十分有限的,通过大幅度提高利率的方法来遏止住房价

格是有难度的。

第二,信贷。通过贷款条件的限制来调节房地产,看似很好的办法,但在房地产市场却会失灵。因为对于银行来说,房地产贷款不仅是利润最高的贷款,并且风险也最小。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希望通过卡紧信贷关口,却难以真正实行。即使国内贷款紧缩,国外的游资也会进入中国市场。

第三,首付比例。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央行准备提高首付比,将首付比提高到五成,随后,央行出面澄清,没有此计划。我国的首付比大多数在三成,这是比较合适的比例,再提高的难度很大,如果老百姓在三成首付比的情况下都买不起房子,那么将首付比提高就更加买不起房子了。除非实行差异化的策略,对于大户型和多套住房实行高首付比,这是可行的。

应充分重视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在2005年、2006年的房地产政策中都充分重视税收政策的作用。“国八条”中有关税收手段是这样的:要充分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调节房地产市场,加大对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等房地产交易行为的调控力度。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免征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2006年7月18日国税总局公布了108号文件,“发布征收个人二手房转让所得税通知,按照20%的税利征收住房转让的所得税。

和金融手段相比,税收政策有明显的优点:可以做到精确打击。在打击房地产投机的同时,不会使其他行业无辜受到牵连,也不会让一般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税收部门与房地产行业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税收政策容易得到贯彻实施。

从国外的经验看,在抑制房地产价格时也十分重视税收政策。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中,税收政策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未来可能会出台的政策包括:不动产税、消费税,也有可能修改所得税法,对房地产的转让实行累进的税率。如果这些政策出台,都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明显影响。投资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未来重点应该是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国八条和国六条的核心都是打击投机、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希望通过市场的途径使住房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得到平衡。但国内外的实践表明,依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使住房市场得到均衡的。完全的住房市场化必然会出现住房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有限的土地资源会配置到收益较高的高档住宅上,而中低收入阶层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住房。不断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多的城市人群无法购买住

房会使住房问题从一个经济问题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为了得出这个结论,西方国家探索了几百年。20世纪初开始出现住房干预政策,现代住房制度开始形成。不少国家把公民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

我国在设计住房制度改革思路时也充分借鉴了西方国家在完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上的努力与探索。1998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住房制度的决定》(即23号文)明确规定:在我国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制度,即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含有一定住房社会保障的经济适用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住房社会保障的廉租屋。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选择,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偏离了该指导思想,企图用完全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我国的住房问题。

对高收入者供应商品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含有一定住房社会保障的经济适用房,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住房社会保障的廉租屋。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选择,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偏离了该指导思想,企图用完全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我国的住房问题

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为了缓和住房价格不断上涨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政府会在住房制度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住房制度的改革思路会回到或部分回到23号文件的精神上来。

从住房制度的实践看,经济适用房在操作中面临分配的难题,受到了市场各方的强烈谴责,对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会作出相应的修改,例如,在10月初北京市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回购制度”就是很好的办法,未来全国的其他城市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很可能都效仿北京市的做法。在我国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廉租房也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但目前的廉租房的覆盖面仅仅限于城市低保人群,这些人口约占城市人口的1%左右,未来的廉租房的覆盖面应该会有大幅度上升,政府会通过大幅度增加廉租房供给的方式来缓解住房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由于我国的住房价格已经连续多年快速上涨,住房消费已经出现了过度消费的迹象,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已经出现比较大的泡沫,如果上述政策出台,会直接冲击住房市场的价格,房地产泡沫随时会出现崩溃,其中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有人心存侥幸,认为政府不会让房地产泡沫崩溃的。是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希望房地产泡沫崩溃的,但有几个房地产市场泡沫没有崩溃呢?再看看中国的股市,2001年后,出台的多少政策意图挽救其下跌的走势,但成效甚微。希望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重蹈股市之覆辙。

■观点

王育琨:警惕财富模式向不动产集中

如今的房地产政策放弃了早期约束并逐步改善住宅消费的目标转而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这种片面的产业政策形成一种独特的财富模式,将迫使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而非急需的高科技和工业化大生产行业。它将消耗掉太多的资源,降低中国的竞争力。

根据最近公布的一些数据,房地产的成本利润率是100%。你要明白这是成本利润率,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利润率超过300%。那么我们看看其他行业呢,医药、电子等行业都止步不前,这些都是国际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利润却远远低于房地产。国家的宏观政策错了,过度倾向于房地产。

宏观问题是政府想让资金流向哪里?因为房地产的利润高,其他行业的顶尖企业都把资金转向房地产,联想和海尔都开始做房地产。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财富模式,它要毁掉中国经济。由此看来,房地产的问题不是建设部能够解决的问题,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看待整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而且它还涉及到社会稳定问题。怎么解决房地产问题是对中国决策者的远见和魄力 的考验。

以前我讲约束住宅消费,现在看来忽略了无房者还是多数这个问题。财富模式向不动产集中,贫富不均也就集中体现在不动产领域。有钱人都把资金投向房地产,有的人可以买100套房子,有的人一套也没有。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像古代的土地囤积。古代很多王朝覆灭前都有大规模的土地囤积现象,明朝如此,汉朝、清朝乃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莫不如此。这个问题要警惕。

目前房地产体制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规划体制问题。规划的支配权实际上关系到土地的支配权。这个权力掌握在市、县一级政府手里。市一级通常通过修改规划来支配土地,县一级则大量存在违法违章建筑。掌握规划权就掌握了土地支配权,也就掌握了财富。土地基本上成为了市、县政府的提款机。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独重开发商的体制。美国的土地是直接卖给私人和投资者的,开发商只是承建商。但中国能获得土地的基本全是开发商。政府为什么倾向于绕开终端使用者,把土地卖给开发商?道理很简单,通过开发商政府可以获得额外的收益,实物地租、各种猫腻和灰色地带就生存于这个环节。土地如果面向最终投资者和使用者,这个灰色空间就会大大缩小。

叶檀:特殊债不是油价拒绝下调的挡箭牌

石油行业的特殊性并不能保证石油产品价格只升不降,近来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只不过重演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油价下降的旧戏码,说明石油市场仍然会随着供需的起伏、对冲基金与购买者的预期发生波动。

每一家石油公司都会面临进行技术研发、提高炼油能力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家石油公司都可以以此为筹码拒绝随行就市进行价格调整。事实恰恰相反,当国际石油巨头的利润高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不仅要付出巨额资源税、暴利税,更要面临议院的严厉质询。

事实上,在市场监管以对企业进行监管的情况下,如何来保证企业将利润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而不是用于增加员工的福利开支?至于以油价上涨节能降耗,提高规避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属一厢情愿。油企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总是希望消费者多多益善,这样才能按照供需关系的经典理论理直气壮地抬高油价,因此,中下游企业的节能不关石油企业的痛痒;为了石油企业自身的节能降耗更说不通,当一个行业其利润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节能激励,正相反,利润越多外在环境越宽松,企业越是缺乏以节能降低成本的忧患意识。

赵晓:宏观调控应瞄准外需

在宏观调控中,最好的办法是用真正的宏观调控取代行政调控。不是硬压投资,而是压缩外需。

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贸易品总额占总产出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超过70%,2005年则攀上80%的历史高峰,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超过所有市场经济大国。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后果是外汇储备剧增。这会带来几方面的负面影响,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汇储备的管理、汇率形成机制以及货币政策的执行将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最该压的其实是外需而不是投资。如果外需降下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话,甚至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快投资。

理由很简单,中国人流血流汗通过外贸挣到的钱再去买美国国债,考虑到其中的利率成本以及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其投资收益近乎为零,根本比不上国内的投资的高收益。因此,外贸顺差越大,中国国民的福利损失其实也越大,这是一笔最划不来的生意。